

【有所思】

保安中街18号

□许志杰

到张店或者坐火车路过张店(淄博市),总是想起爷爷和奶奶,想起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保安庄保安中街18号,想起陪爷爷奶奶过年的幸福时光。

有一年出差住在张店,晚饭后便顺着火车站下的道去找保安中街18号。小的时候,每逢过年,父母就把我送上开往张店的火车,去陪着爷爷奶奶过年。下了火车就是沿着铁路边的这条下路,一直往前走不到1000米,然后右拐拐入保安庄中间的一条街,往南走大概200米,就是我打小就熟知的保安中街18号。

记得道路两边堆满了石头和石子,为的是让住在附近的人家利用闲暇工夫砸石子挣几个零花钱。我对此很感兴趣,也充满了好奇,有时站在一旁看别人砸石子连吃饭都忘了,奶奶就站在街上大声喊我。看着邻居全家齐上阵,把砸好的石子装在一个柳条编的筐子里,送到收石子的人那里,当场领回两块钱,真是羡慕不已。尤其是砸石子的过程,很是刺激和震撼,先用一把大铁锤把块石砸成拳头大小,然后放在一个自制的铁圈里,再用小锤子一锤一锤砸下去,直到砸成像小孩子玩的琉璃蛋那么大的小石子。那个铁圈的作用非常大,既能把石子圈在里边防止石子被砸得到处乱飞伤人,还能替代手去翻石子,这样手就不易受伤了。

我一直不解我们家为什么不能砸石子,就问爷爷,他说我们家没人砸,爷爷奶奶岁数大不能砸,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妹妹岁数小,也不能砸。但是,我看见很多

比爷爷奶奶岁数大、比妹妹岁数小的人都在马路边砸石子。后来我听说,不是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家都能砸石子的,收入低、家里孩子多、生活拮据的家庭才被允许。虽然只有爷爷一个人有工作,但他是火车司机,每月80多元的工资在当时属于高薪,这样的家庭是不能去跟别人家抢饭吃的。

物不是,人亦非。奶奶爷爷已先后去世,从火车站到保安中街的道路已经拓宽,当年那种全家上阵热火朝天砸石子的场面荡然无存。我边走边想着记忆中那些断断续续的情景,一辆汽车从身边驶过,好像就是砸石子发出的叮隆当啷的声音,此起彼伏,好生热闹。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容易满足,也充满着激情,为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,出多少力流多少汗都在所不惜。据说,砸石子就是为了备战之用而修建的辛大(辛店到大汶口)铁路,现称辛泰(安)铁路,国家力量不足,就发动老百姓全民参与,解决一时之难。

这条从火车站下通往保安中街18号的小道,也是爷爷上下班必经之路。爷爷从上世纪30年代就在胶济铁路开火车,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张店机务段当火车司机,一千就是近30年,直到退休。在这条小道上爷爷走了多少个来回,留下多少脚印,真的是难以用数字去表述,只能说年复一年、月复一月、日复一日,爷爷就是通过这条小道重复着自己简单而充实的人生。

爷爷到张店之后,奶奶也跟着一起过来,那时铁路部门没有自己单独的宿舍区,他们就住在

当地房管局提供的两间简陋而狭小的厢房,就是保安中街18号。这是一个不小的四合院,其他三个朝向的房子还是挺大挺整洁的,都是开间的大堂外带两个套间,边上还有一个不大的厨房。爷爷奶奶住的是西屋朝东,低矮潮湿,两间房子加在一起的面积顶多有30平方米,没有单独的厨房,做饭只能在外间的火炉上。后来,妹妹到了张店跟着老人一起生活,过年的时候,姑姑家的几个表弟也经常过来,我们表兄弟挤在一张床上,其乐融融。依稀记得保安中街18号住的几位邻居,有一家姓贾,还有一家姓郭,他们和爷爷差不多岁数,都是张店附近淄川、博山一带的人,说着一口浓重的方言,很多口音重的话我都听不大懂,唯独他们亲切地喊爷爷“许大哥(guo)”,至今记忆深刻。

保安中街实际是一条很长的胡同,大概有1000多米,泥泞的道路两侧是挖得很深的出水沟,雨水和胡同里住的人家的污水,都是通过这条出水沟排到马路上的地下管道。夏天蚊蝇横飞,冬天道路两边结的冰一层摞着一层,生活环境非常恶劣。奶奶是裹的小脚,到了冬天就不太敢出门,生怕滑倒。生活用水也不方便,整个一条保安中街只有几个公用的水龙头,需用水票,一桶水一张水票。每到傍晚就去排队打水,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,倒是一副热闹欢快的场面。最让人犯难的是如厕之事,公共厕所分建在街的两头,整个一条街的人争用本来就十分拥挤的如厕资源,紧俏程度可想而知。尤其是早晨经常要排

队如厕,各种景象频仍而现,很是具有市井之风。天暖和的时候还好说,无非就是急点;冬天寒冷,如厕便难上加难。各家只好自备小解用具,天亮了提着倒到公厕。晚上十有八九路灯是不亮的,出去一趟要用手电照着,没有手电的就划一根火柴,照亮前行的路。

想想那时候的所谓城里人,其实日子过得也挺局促,有时候甚至非常艰难。爷爷和奶奶就是在这里一住大半辈子,两位老人也真是不易。后来他们搬了一次家,住房条件比以前略有改善,但周围的生活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。对我而言,还是非常怀念保安中街18号的那段时光,平时和爷爷奶奶不在一起住,这个短暂的春节使我们祖孙团聚在这里,使我得以加深对爷爷奶奶的认知和亲情。现在想到还会涌起一股暖流,思念之情油然而生。

当年的保安庄已经被成片的楼宇取代,保安中街18号更是毫无痕迹,与在楼下打牌的人聊起这里,他们全然不知,一脸茫然,对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们一无所知。即便是这样,只要到张店,我也一定会来,闻一闻这里空气的味道,这里有小时候爷爷奶奶留下的味道。一列火车从隔着的一道墙外疾驶过去,爷爷开火车的时候每到这里就会拉一声汽笛,只有奶奶听得懂的火车汽笛。听到笛声,奶奶知道远行的爷爷开着火车回来了,就开始做饭,备上浓酽的花茶,烫上一壶坊子白酒,等着爷爷下班回家……我就会跑到胡同口等着,帮爷爷提着饭盒回家。

【浮世绘】

美食与故乡

□冯磊

曾有作家就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表看法。他说,我们的社会生态正在经历一场变革,在文化碎片化的同时,传统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;从这个角度来讲,我们都是异乡人。

此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晚清时代,李鸿章曾发出传统文化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感慨。倘若李鸿章再世,面对今天的变化,不知会有何感想?

面对滚滚而至的现代化车轮,每个蜗居者都是异乡人。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,乡村的每根血脉都被连根拔起。但是,也有例外。比如说,我们还有美食。

我有朋友,几年前已经内退,孩子在济南上大学。有一天,他问女儿:“想吃点什么?”女儿回答说:“想喝羊肉汤。”这位父亲马上到楼下餐馆买了斤羊肉,连汤一起装到保温桶里,乘动车飞驰而去。两小时后,女儿大呼小叫着从宿舍里跑了出来,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事后,有人质疑说:“一张动车票比那半斤羊肉要贵得多,有必要这么做吗?”当父亲的笑了一下,说:“我只是想提醒她,别忘了老家的味道。”

美食在,故乡就在。



我所在的县城,人人喜欢吃菜煎饼。在学校和市场门口,随处可见女同胞排着队买菜煎饼,生意极好。上世纪90年代,有人在某中学门口卖菜煎饼,不仅供两个孩子读了大学,而且在县城买了三套房子!

去北京旅游,路遇打着滕州菜煎饼招牌的小店,我进去买了一卷。拿来一看,完全不是滕州的做法,味道也差得很远。问老板,知道他是山西人,此前吃过滕州菜煎饼,于是依样画葫芦,生意竟也不错。他做的菜煎饼我仔细看了,有点像周村的烧饼。薄薄的面皮里面,裹着些碎花生

什么的,味道差了很多。

出门在外,一切在变化。但,我的口味没变。在异乡的大街上,味蕾始终提醒着我的归属。

有一次,到连云港旅游。下了火车,在附近旅馆里安顿下来。吃过一顿干蒸米饭,又喝了两杯水。当天下午,呕吐不止。

店主是梁山人。他打开我的水杯,倒了杯水给我。喝完水,一夜无话。天亮后,体力恢复过来。老板说,喝了从老家带来的水,对身体恢复有帮助。

前年到某地出差,见到一家标注“X记炸酱面”的面馆。心里一热,就走了进去。在我所居住的县

城,“X记”小有名气。老板和老板娘年龄比我大两岁,生意极好。他们开面馆已二十多年,手下分店有十多家。在那家面馆,我按惯例先舀了一碗面条汤(面条汤是用不锈钢桶盛好了,放在柜台前面的)。喝过汤,慢吞吞吃完了那碗家乡面,感觉离家并不远。

去年,在参观某地民俗馆的时候,我见到了一个“油撇子”。这东西历史悠久。具体做法如下:用剪刀剪出直径三厘米左右的明铁皮,放在铁砧上轻轻敲打,待铁皮中间出现了弧度,在其侧面固定好一根细细的长杆,一个油撇子就做成了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也就吃二斤油。为了节约,我们每次炒菜都要用油撇子“撇”上那么一点油。看到这东西,我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想起自家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,老家门前的楝子树和门口的“石敢当”。之后,我对自己说,我还是原来的我,还有回得去的故乡。

“哪里有自由,哪里就是我的故乡”。这话究竟是谁说的,我已经记不起了。在我,这句名言也可以改造一下:哪里有家乡的美食,哪里就可以安顿我这颗惶惑的心。

【在人间】

花甲

□王兆贵

路过一条小街,偶然发现有家新开张的小店,门楣的招牌以海滩为淡淡的背景,上书“花甲”二字,不免有些好奇。在我的常识中,“花甲”是人到六十的俗称。按天干地支循序组合,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最小公倍数是六十,天干起始之甲与地支起始之子,每六十年碰一回面,称为一个甲子,亦称花甲。怎么会与吃食搅到一块呢?进店一看,呈现的却是各式各样的花蛤,这才明白,原来这是一家专卖贝壳类海鲜的小吃店。

恕我孤陋寡闻,将花蛤称为花甲,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尽管这花甲不是那花甲,但在年逾花甲之后误读花甲,不由想起了一些关于花甲的往事。

海蛤的种类很多,花蛤不过是海蛤家族的成员之一。即使按学名将它们统称为贝,也很难说清究竟有多少种类。同是沿海地区,各地对海蛤的叫法也不完全相同,但从古籍记载来看,比较一致的叫法是蛤蜊。这一名称,在古代很早就有了。

南朝齐文学家王融,年少时拜见王僧佑,碰上沈昭略也在那里。沈昭略与王僧佑性情相投,都是不事公卿的狷介之士。沈昭略因不认王融,就问这个小家伙是谁。沈昭略愤愤不平地说,我乃东出扶桑西入大海的太阳,光耀天下,谁人不知,您怎么会有此一问呢?沈昭略答,没听说过这些事,还是吃蛤蜊吧。这段轶闻传开来,

后人遂以“且食蛤蜊”代指姑置不问。

客居南京四十余年,但对蛤蜊记忆尤深。龙口老家西北一带面朝大海,蛤蜊是常见的海鲜。人们把蛤蜊叫作嘎喽(变音),或称蚬子。一般蚬子外壳光鲜,有纯白的,有带花纹的,外壳微黑且长毛的是毛蚬子,南通、上海等地称毛蚶。在我国,蚬子的叫法并非一地独有,也不是今天才有的。清代蜀中才子李调元在《南越笔记》中提到:“粤人谣云:‘南风起,落蚬子,生于雾,成于水,北风瘦,南风肥,厚至丈,取不稀’。”这也说明,蚬子在东南沿海多的是,不稀罕。这玩意儿个头不大,形状可爱,煮熟了鲜得很。比起扇贝、北极贝等海

鲜中的贵族,蚬子当数大众美食。

小时候,每逢农闲季节,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带上简易工具和网兜,跟大人去赶海挖蚬子。挖蚬子的工具,是网状的铲子。脱掉鞋子,挽起裤脚,走进浅海里,用铲子在泥沙中推上一阵再捞起来,就会有蚬子落网。还有人不用网铲,腰上系着装蚬子的网兜,走到齐腰深的海水里,仅凭脚趾捻动的功夫,就能踩到蚬子,然后用大脚趾和二脚趾夹起来,接到手里,放进网兜。那时渤海湾的蚬子多的是,半天下来,少则三五斤,多则十余斤。不知是海水污染的后果,还是填海造地的缘故,于今,除非专事海底捞的渔民,普通人家很难在浅海里挖到蚬子了。